

中国革命与建设史论

主 编 李振亚

副主编 邵云瑞 刘景泉

编写者(以写作章次为序)

张 静 赵铁锁 窦爱芝

刘景泉 李振亚 崔荣俊

徐 行 邵云瑞

天津大学出版社

中国革命与建设史论

李振亚 主编

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大学内)

邮编:300072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¹/₈ 字数:263千

1995年9月第一版 199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100

ISBN 7-5618-0764-3

K·33 定价:10.80元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向西方学习之路为什么走不通

- 一、近代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
 - 1. 独立封建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1)
 - 2.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 (9)
- 二、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斗争 (17)
 - 1.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17)
 - 2. 新兴社会力量的出现 (21)
 - 3. 近代中国向西方探求真理的历程 (22)
 - 4. 西方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 (43)

第二章 走俄国人的路——中国革命的新选择

- 一、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 (47)
 - 1.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文化运动 (47)
 - 2. 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55)
 - 3.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61)
- 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民革命 (68)
 - 1. 国共合作的实现和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68)
 - 2. 五卅运动和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加剧 (76)
 - 3. 北伐胜利进军和全国革命高潮 (81)

4. 国民革命的失败·····	(87)
-----------------	--------

第三章 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一、国民党南京政权没有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	(92)
1. 南京政权依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	(92)
2. 南京政权统治下的民族资本主义·····	(96)
二、中间势力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	(99)
1. 第三党的反蒋斗争·····	(99)
2. 乡建派的改良主义实践·····	(102)
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 ·····	(105)
1. 坚持革命,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	(105)
2.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 ·····	(110)
3. 中国革命新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	(122)

第四章 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一、国共两党从内战走向再次合作 ·····	(129)
1. “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29)
2.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32)
二、空前规模的全民族抗战 ·····	(139)
1. 全民族抗战的发动·····	(139)
2. 两条抗战指导路线和两个战场·····	(143)
三、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	(151)
1. 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战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151)
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对争取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155)
3. 中国共产党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	

证了全民族抗战进行到底·····	(162)
4.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原因·····	(166)
四、中华民族振兴的新起点 ·····	(178)

第五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 ·····	(180)
1. 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	(180)
2. 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183)
3.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185)
二、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 ·····	(191)
1.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191)
2. 中间道路幻想的破灭,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的形成·····	(202)
三、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和基本经验 ·····	(212)

第六章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一、向社会主义转变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	(216)
1. 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向社会主义过 渡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216)
2. 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225)
二、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与实践 ·····	(229)
1. 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运动·····	(229)
2.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	(235)
3.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就·· ·····	(242)

第七章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248)
1. 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和十大关系	(248)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构想	(252)
3. 中共八大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254)
二、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失误	(258)
1.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曲折	(258)
2. 调整政策,战胜困难,继续前进	(263)
3. 十年探索中的两种趋向	(267)
三、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严重挫折	(270)
1.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全面发动	(270)
2. “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和教训	(274)

第八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

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281)
1.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281)
2. 历史性的转折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85)
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	(288)
1.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起步	(288)
2. 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完成	(293)
3.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	(296)
4.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302)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括	(307)
四、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312)
后记	(317)

第一章 中国向西方学习之路为什么走不通

一、近代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 独立封建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地大物博，民族众多，人民勤劳、智慧、勇敢。在 15 世纪以前，曾以高度发达的文明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万里长城，是宇航员从月球上看到的地球上最显著的标志。一千二百多年以前开凿的贯通中国南北交通的大运河，到今仍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中国的四大发明更是对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马克思曾就此谈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连资产阶级的评论家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

中国不但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之一。自秦汉时起，中国就成为统一的封建强国。到了唐代，中国经济文化的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唐都长安更成为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时载，长安城里外国宾客如云，络绎不绝，仅日本就曾 19 次派遣唐使来中国。元代时意大利旅游家马可·波罗曾游览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在其晚年著成的《马可·波罗游记》（又名《东方见闻

录》)中生动地记述:中国是“天堂”一般的国度,政治开朗,宗教自由,人民道德。中国的富庶与经济繁荣,“实在是难以笔述的”。《马可·波罗游记》出版后,迅速风行欧洲,中国就如同《圣经》中的乐园,使西方人醉心向往。

但是,国家的先进,除了人民的勤劳、智慧、勇敢的程度,自然条件的优劣以外,主要是取决于生产力和制度发展程度。不同的政治状况,不同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必然会带给社会以不同的经济后果。16世纪以后,以英国首创其端的许多西方国家陆续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使生产力获得了空前未有的解放。而18世纪开始的产业革命,是人类将手工技术过渡到机械技术的伟大社会变革,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发展的一次巨大飞跃。它与普遍繁荣的近代科学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带给西方各国以不断的变革和迅猛的发展,工业生产成倍增长,农业经济空前繁荣,交通运输巨大改观。总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经济实力迅速膨胀的资本主义国家,遵循“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为寻找日益增长的工业市场和工业原料,以新航路的开辟为前导,将贪婪的手伸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强迫落后国家缔结不平等条约,甚至武装掠夺他国领土,拓展殖民地。

中国与上述情况恰好相反。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和国民经济产业的技术革命并没有发生。伴随着嘉(庆)道(光)时期以来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腐朽的,是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发展停滞,整个社会经济呈现一片衰危破败的景象。

经济上,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仍旧是封建国家的主要经济基础,以封建地租和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的经济体制,使国民经济就象运转的齿轮,周而复始地作着圆周运动,其结果是土地高度集中,贫富极为悬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空前尖锐;另一方面,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非常缓慢。而在自然经济低水

平生产的基础上,必然缺乏强劲的社会需求的驱动力和经济产生飞跃的物质条件,以致无法抵御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挑战。

政治上,封建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发展已经达到极限。以高度集权和极端专制为特征的国家权力机构危机四伏,极其腐败。统治者骄奢淫逸,不睬民众疾苦,各级官吏贪赃枉法,追逐利禄,搜刮钱财,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与之相联系的是军力衰微,军备废弛,部队大都丧失了战斗力。

思想文化上,以儒家传统文化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精神支柱。程朱理学与科举考试制度相结合,严密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屡兴的文字狱使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呈现万马齐喑、一片沉寂的局面。

对外关系上,千年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妄自尊大的心理态势,导致了行动上的盲目排外。视自己的文化为“唯一的高度文明”、自己的国家为“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接受一切外来的先进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拒绝一切改革与借鉴,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昧已经达到了极端的程度。

以上情况表明,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已经达到量变发展的极限,改变这一体制的行动或要求已不可逆转。在世界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时代,封建落后而又人口众多、市场广阔的中国,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的猎物。1840年英国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下发生的。

鸦片战争的爆发,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早在18世纪末,英中贸易总额已达1000万两以上,占当时中国对欧美各国海上贸易总值的80%,高居列强对华贸易的榜首。以后,英国对华贸易继续扩大。在1760年至1833年的七十余年中,英国对华输出总值增长15倍,由中国输入总值也增长9倍。英国资本家仅在茶叶贸易上所得的利润,就达到26%以上,有时竟高达43%。英国政府从茶叶贸易中得到的税收,一般占国库税收的1/10。这无疑对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但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和清政府实行的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着英国工业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英国资产阶级很快就发现,英国对华贸易在一般商品交换中几乎占不到什么便宜。英国对华输出的商品以毛织品为主,但18世纪东印度公司运往中国的毛织品,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经济的顽强抵抗,基本上年年亏本。金属制品的销路也极为有限。反之,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生丝、大黄、香料等,在英国市场却供不应求,进口量逐年增加。正如英国人格林堡所说:“自16世纪至19世纪,在这近300年的中西交往中,最显著的事实是: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为此,英国不得不每年向中国运来大批白银。1781年至1790年,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仅茶叶一项就高达9600万银元,而同期英国输入中国的全部工业品总额只有1600万银元。据统计,18世纪末,英国在对华贸易中,每年至少亏损数十万两。这一事实,对于急于扩大市场、推销本国工业品以获取最大利润的英国资产阶级来说,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忍受的。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英国资产阶级想尽了各种办法,其中包括借助战争,以武力达到目的。1793年7月,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要求清政府在广州之外增开舟山、宁波、天津等口岸,准许英商在北京设立货栈,割舟山及广东附近小岛作为英商居留地。清政府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为由,认为马氏所提要求“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1816年阿美士德奉命来华,只因在觐见礼仪上固执己见,触怒“龙颜”,竟被驱逐回国。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攫取超额利润,继续进行外交以外的尝试。1825年爆发的英国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快了其占领中国市场的步伐。1830年,47名在华英商上书英国议会,赤裸裸地要求英国政府“采取与英国国家相称的决定,并占领中国沿海岛屿一处”,作为侵华的商业和海军据点。所以,即使没有中国后来的禁烟运动,英国资产阶级也会寻找其它借口发动侵华战争。

19世纪初年,英国资产阶级终于找到了打开中国门户的特殊

商品——鸦片。他们采用贿赂中国官吏、武装走私等手段，大量向中国倾销鸦片。1773年英国每年以药品名义向中国输入的鸦片不过200箱，1838年猛增到40000箱，六十余年增长了200倍。鸦片的大量输入，根本改变了中英贸易形势，使中国由200多年来的贸易出超国变成入超国。英国商人通过贩卖鸦片所获得的白银，不仅抵偿了从中国进口大量茶叶、生丝等所造成的贸易逆差，还使中国白银大量流入英国资产阶级的钱袋。据统计，中国白银外流数额，1825年至1829年平均每年为250万两，1830年以后，每年达400多万两，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每年更在500至600万两以上。总计鸦片战争之前2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约达1亿两。

鸦片的大量输入，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由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政权，不能够掌握可以使他们越过历史极限的商品自由化手段和原则，而且也是改造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民族结构、增强民族内聚力、抵御外来资产阶级民族扩张主义的手段和原则；不能够认识这是历史为他们提供的最后一种能否象60年代日本地主贵族那样，通过维新继续主控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不能够按照商品经济的价值法则、严格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运用关税壁垒和对英贸易等手段，将英国鸦片挤出国内市场。致使鸦片在中国的泛滥日甚一日，一方面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也加重了清王朝统治的危机。正如林则徐所言：“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出于切身利益考虑，1838年底，道光皇帝委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在当地群众和开明官绅的协助下，林则徐采取严厉果断的措施，迫使英商交出鸦片两万箱，共237万多斤，并于1839年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虎门销烟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的意志与决心，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

虎门销烟以后，当时英国驻广州的商业监督义律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认为中国的销烟举动是“可耻的挑衅行为”，是

“不可饶恕的暴行”，要求英国政府“应该给以迅速沉重的打击，而事先不必给一个字的照会”。1840年4月英国议会通过决议：“对于中国人的侵害行为，必须得到满足与赔偿，以此目的，捕获中国船舶及货物，自属正当。”帕麦斯顿更加露骨地说：对中国“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这种野蛮的强盗逻辑，成为自此以后百年间资本主义奉行的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

鸦片战争从1840年6月开始，1842年8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结束。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1843年7月和10月，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南京条约》及其附件规定：中国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由中英双方协定关税；英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交涉词讼”，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脱出了由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常轨，开始了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程。政治上，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独立主权受到侵犯，中国开始受制于西方列强；经济上，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日益瓦解，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供应地。鸦片战争成为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

1856年至1860年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加快了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割让九龙司给英国；赔款800万两白银；开放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和天津为通商口岸；公使驻京；鸦片贸易合法化等等。此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开始深入中国内地，逐渐控制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并开始垄

断中国的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步解体，并加速了农村封建经济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演变；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非正常发展，明显地表现出半殖民地经济的特征，尤其是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侵略的需要，在中国造就了买办制度和买办资本，形成了买办资产阶级，这更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典型特征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还加速了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战争的结果使侵略者认识到，与其推翻清政府，不如扶植它作为自己控制中国的工具；而清朝统治者也发现，外国侵略者并无取代自己的意图，只要“外敦信睦”、“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封建统治政权就可相安无事。1861年1月，清政府秉承西方侵略者的旨意，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办理对外事务。同年11月，慈禧太后借助洋人的支持，发动“北京政变”，掌握了清廷政权。1862年1月，清政府正式确定“借师助剿”的反动方针，标志着清政府以洋人为靠山，开始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工具。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皇俄国政府趁火打劫，以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璦琿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等，除攫取在华特权以后，至1884年，共侵占中国约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3个法国或12个捷克的面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如此大规模地吞并别国领土，是世界史上所罕见的。

19世纪末叶，世界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中国则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竞相掠夺的对象。在此形势下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马关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后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赔款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等等。《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之后又一个影响至深的卖国条约，使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由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打破了列强在华的原有“均势”，引起了帝国主义对

于中国的重新争夺,从而导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夺取“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对中国的掠夺由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资本输出为主,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华投资设厂、筑路开矿,强化经济渗透和控制,逐渐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通过大量的政治性贷款,操纵中国财政,控制清政府,使清政府在财政和政治上更加依附和受制于帝国主义列强。

1900年发生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实际是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直接延续。甲午战争以后,空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反侵略、反瓜分、反洋教斗争如火如荼,并逐渐汇成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及其直接瓜分中国的企图。1900年6月,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八国组成联军入侵北京,与清政府联合绞杀了义和团运动。1901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拆除北京至大沽沿路的一切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类组织;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副沉重枷锁,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政治上,帝国主义的“顾问”充斥于清政府的财政、经济、军事、外交等要害部门,并控制了实际权力,帝国主义各国的驻京使团俨然成为清廷的“太上政府”;经济上,巨额的战争赔款使中国经济进一步陷入崩溃境地,帝国主义还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路权、矿权,通过在华银行进行资本输出,进一步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军事上,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要地驻军,向清朝军队派遣顾问,甚至将中国的土地作为彼此厮杀较量的战场;文化上,通过传教、办学、开医院、出版报刊、培养留学生等方式,加紧对华的文化侵略与渗透。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帝国主义列

强已经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完全控制了清政府。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竟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表明清政府已经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如下特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不但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和近代中国一切灾难与祸害的总根源；封建势力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是近代中国最反动、最腐朽的势力；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已开始解体，但封建剥削制度依旧保持，并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结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虽有某些发展，但力量极其软弱，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中国的经济文化仍然非常落后；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实行分裂剥削政策，由于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存在，造成中国实际上长期的不统一，所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罕见的。

上述特点说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渗透，本国封建主义统治的昏庸与腐朽，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两个基本原因，而前者尤其是主要因素。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势力的靠山，中国封建势力则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则是最主要的矛盾。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伟大的近代中国革命，就在这些基本矛盾不断激化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2.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

来了无穷尽的灾难。他们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多达 300 多个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的领土被割让,港口被霸占,关税主权被侵夺,财政命脉被操纵,路矿权力被掠夺,列强势力范围遍及华夏,国家主权支离破碎,民族经济凋敝萧条,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近代中国八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专制统治,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而由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决定,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损坏了中国的国家独立。一个国家独立的完整标志,就是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独立。而自《南京条约》英国割占香港以后,葡萄牙割占澳门,沙俄割占东北、西北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1898 年开始的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更使中国面临被肢解的威胁。在甲午战争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先是沙俄以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有功为由,将东北划为其势力范围,并强租旅顺和大连港;法国则以两广和云南为其势力范围,并强租广州湾(湛江地区)九十九年;德国以山东为其势力范围,并强租胶州湾为军港;英国注重巩固其在长江流域的势力,并强租威海卫、九龙半岛和香港附近岛屿,向中国南北扩张;日本则强行以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因当时忙于和西班牙争夺菲律宾的战争,迟到中国一步,但并不肯就此罢休,1899 年提出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列强按“利益均沾,机会均等”的原则,承认美国在各国势力范围内享有同样的特权;列强还在中国 16 个城市中,开辟了 44 处租界地,面积达 7 万余亩。租界内行政、立法、税收等部门,完全由外国人掌管;对租界的事,中国政府无权干涉。使租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大本营。

中国的国家主权,从鸦片战争以后就不断受到资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践踏。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在华攫取了关税协定权、沿海贸易权、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运权、铁道管理权、矿山开采权、驻军权等等。凭借这些特权,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天空中和海

洋里,不受中国任何法律的管辖,胡作非为,肆行无忌。

资本帝国主义还可以随意调遣中国的警察和军队,可以随意更改中国的法律,操纵中国的外交,控制中国政府的“最后决定权”。海关是任何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保护本国市场、保护民族经济发展、捍卫国家独立的重要机构。但从1858年起,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就由英国人李泰国与赫德先后担任了五十二年。在他们的把持下,旧中国海关成为涉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种事务的庞大权力机构。李泰国曾以清政府的名义,任命英国海军军官阿思本为中国舰队司令,并“代表”清政府与阿思本签订合同,授命阿思本对中国舰队“有完全指挥权”,“阿思本将任命海军船只上一切官兵,由李泰国作为皇帝之代表予以批准”。赫德也逼迫清政府任命他为“邮政总办”,还公然要求清政府任命张凯嵩、吴棠为四川总督。此外,他还在《中法新约》的签订、中英缅甸和西藏问题的交涉、澳门主权的丧失等重大事件中,积极为外国侵略势力谋求利益,使中国蒙受了重大损失。1868年,清政府曾派出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欧美,但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前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团的左右“协理”分别由英国使馆的柏卓安和法国人德善充任,而中国官员道志刚和孙家谷的身份只是随员。“中国代表团”到达美国后,蒲安臣竟私自“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亦称《蒲安臣条约》),承认美国享有掠夺华工以及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学校等特权。此外,帝国主义还公然将中国作为彼此争夺的战场,1904年日、俄在东北三省厮杀,1914年日、德在山东境内火并,更使中国主权受到的损害达到令世人瞩目的程度。

第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的财富被无止境地搜刮和掠夺。从1840年算起,侵略者从中国掠夺、搜刮的财富究竟有多少,是难以统计的。仅1842年、1860年、1895年、1901年的四次战争赔款即达关银7.1亿两。其中,1895年一次对日赔款就达2.3亿两,而中国当时的国库收入不过每年7000余万两。1901年《辛